

外国记者眼中的印尼

〔法〕布赖恩·梅 著

克勤 张微 明江 幼云 世垠 译
妙发 文献 志穷 永光
黄书海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Brian May

The Indonesian Tragedy

First Published in 1978 b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根据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有限公司 1978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伍永光

封面设计：刘昌苓

外国记者眼中的印尼

〔法〕布赖恩·梅 著

克勤 张微 明江 幼云 世琅 译
妙发 文献 志穷 永光

黄书海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25,000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3003·1732 定价：2.80 元



纳苏蒂安、苏加诺、苏哈托（从左至右）



苏加诺与哈蒂妮夫人



苏加诺与他的日本夫人黛维同周恩来总理合影

苏加诺致黛维夫人的亲笔信

Dear darling Devi,
 I received your two letters.
 I am glad that you heard
 my speech, and thank you ~~that~~
 that you appreciate that speech.
 Pranoto is rather weak, staff
 member of the Army headquar-
 ters, but he is the only man in
 the M. B. A. D. who can deal
 with left and right. I appoin-
 ted him as daily caretaker for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army
temporarily. The army-command
I have taken in my own hand.
 As soon as things are quiet
 again, I shall appoint the
 definitive army-commander.
 I don't know yet where Yani
 is, or what is exactly with him.
 And as soon as things are
 safe, I shall return to Djaka-
 ta. Today's information was:
 "not yet".
 I am constantly thinking
 of you. You know how I
 love you. 1000 kisses
 Sukarno.



印尼共产党前主席艾地



贫困的印尼老妇



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布鲁岛上的“政治犯”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九·三〇运动”，数十万印尼人民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场悲剧的内幕如何？军事政变当局夺取政权后执行了什么内外政策？流放到布鲁岛上的“政治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被印尼军事法庭审讯的印尼共领导人的供词是否可信？领导集团中如何争权夺利？苏加诺总统的大权如何旁落？他是怎么死的？……

对这些印尼国内外舆论极为关注而说法又极为纷纭的问题，本书提供了许多堪称第一手的材料。作者布赖恩原为法新社驻雅加达分社社长。他在印尼阅历深，见闻广，为写作本书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广泛采访，从苏哈托总统到一般军人，从支持苏哈托政权的政党头目到被迫合并或解散的在野反对党的领袖和被流放的“政治犯”，此外还有法律、实业以及社会各界高、中、低级人士。书中不仅透露了许多首次公之于世的内幕情况，而且提供了一部真实感人的报告文学和绘声绘色的历史画卷。

此书原名《印度尼西亚的悲剧》。作者在书中夹叙夹议、广征博引，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是印尼国内外同一题材著作中有代表性的一部。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3
绪论 根子	4
第一部分：旧秩序的终结	27
第一章 囚犯们	27
第二章 苏加诺的重任	41
为团结而奋斗	41
黄种人	53
同荷兰人作战	62
临时国会	64
有领导的民主	77
共产主义和真主	87
第三章 “政变”之谜	92
事实	92
印尼共产党问题	104
大屠杀	121
海神之子 and 山姆大叔	126
第四章 苏哈托的崛起	130
组织学生	130
军事政变集团	137
政治斗争	145
新总统	154
第二部分：新秩序	161

第五章	联合国的惨败	161
	外貌	161
	暴乱	169
	纯属幻想	177
	苏查尔的笑话	183
	排练和表演	187
	罪犯	191
第六章	扫荡	196
第七章	贪污腐化	210
	石油王国	210
	苏哈托和“主公们”	214
	学生的控诉	223
第八章	分而治之	229
	对印尼民族党的教训	229
	苏加诺之死	234
	专业集团竞选	239
	对穆斯林的袭击	244
	大选	260
第九章	政治的终结	268
	拼凑人民协商会议	268
	结束政党的生命	276
第十章	争夺权利	285
第三部分：不坚固的堡垒		303
第十一章	文化障碍	303
	幽灵世界	303
	没有出现的企业家	306
第十二章	发展的神话	326
	西方的解决方式	326
	滞胀	341

大米危机	350
资本主义前期思想意识	357
第十三章 调和的代价	374
跋	400

前 言

我于1968年11月到1973年1月在雅加达担任法国新闻社分社社长，这本书就是在我从事报道工作的4年期间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此书虽然比过去出版的同类书涉及的面更广泛，包含着自1965年印尼“九·三〇运动”以来的历史事件，但它不是历史书，而是要阐述本书书名的主题——印尼的悲剧。本书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西方扶植的专制政治。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目前身受的痛苦，本书虽有不少的描绘，但这并不构成其悲剧。悲剧的根子还要深得多，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有必要涉猎一下印尼的历史和文化。仅仅从社会苦难的现象方面去找原因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我力图在很大程度上以我个人的体验来描绘印尼，从而引导读者象我那样去看待印尼问题。

人们对第三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误解，特别是对那些一旦撤掉西方援助，其政府就会垮台的国家，误解尤深。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董事拉尔夫·达伦多夫就是这样。他曾任欧洲共同体的科学与研究专员，也曾到雅加达作短期访问。他在1974年为英国广播公司讲授里思课程期间说，印尼是一个“处在门槛上的国家”之一。他解释说，“那些即将到达门槛或已经到达门槛的国家，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向前发展”。事实上，如果说印尼已接近什么门槛的话，那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墓地的门槛而已。1975年年底，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宣称，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已为比较贫穷的国家建立了农业援助基金。可是印尼几个世纪以来的经历表明，粮食生产的增长总是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在许多不同的贫困国家的调查表明一种趋向：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对于亟需的巨

大消耗量说来，只是小有弥补而已。

把比较富裕的国家的财富转移到比较贫穷的国家去之说是如此不切实际，以致人们怀疑此说之诚意。我认为，西方国家对印尼的援助很少可能超过印尼对出口的补贴，这无论对印尼人民或所谓捐赠者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援助是与印尼严酷地掠夺劳动人民的内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印尼这种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的巨大灾难，有助于苏联把印尼变成另一个安哥拉。这种可能性本书将在最后一章予以探讨。

布赖恩·梅

于荷兰 济里克泽

致 谢

我必须在这里向那些在我写作本书各阶段给予帮助的人致以谢忱。迈克尔·利弗博士提供的情况使我在论述印尼独立初期的章节中加深了分析。英格里德·帕尔默博士审阅了有关印尼经济的那一章，她并为我作了注释。D·H·彭尼博士和哈罗德·克劳奇博士，我都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在来信中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的合作者埃罗尔·霍奇先生解决了资料方面的问题。荷兰莱顿大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助理员弗兰卡·M·庞特—波尔夫人，一直迅速地把我所要借的书邮寄给我。有4位学者曾帮助过我，但要求我不公开向他们致谢，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与此书的瓜葛公开化，可能导致印尼军政府妨碍他们或与他们有关的人们在印尼的工作。在保持他们匿名的同时，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是其中两位费了很多心血审阅了我的手稿，避免了若干不应有的错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不能公开向一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印尼朋友致谢，否则将会使他们招致麻烦。但我深深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如果因为我写的东西使他们对国家的前景感到过于悲观的话，我希望他们原谅我。我的妻子曾指出我稿子中某些思路不清的地方。尽管她的家务和公事十分繁重，她尽量挤出时间来为草稿打字，并作了多处修改。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此书不知将推迟到何年何月才能问世。

绪论 根子

通常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其悲剧具有各种形式。最明显的几乎都是由于经济停滞不前而带来的不幸后果，例如孟加拉国。不太为人所知而却相当有害的事实是，它们徒劳无益地追逐西方式的经济目标，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文化落后的障碍；本来可以从中引导出比较好的生活的传统结构，却早已被破坏殆尽；为了达到不能达到的目标，对无可取代的东西进行持续的损害。实际上，经济停滞依然存在，只是被虚假的经济活跃现象掩盖着罢了。这就是印尼的悲剧，某些国家也是如此，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在一些小国里，由于文化上的变革，可能消除了一些障碍，然而这却是无足挂齿的。但对于大国说来，可能包括中国，还面临着工业化问题，其改革需要有一个教育规划，但财政上又不许可。例如，印尼每年国内生产总值以人均计，只及美国在教育上花费的钱的1/3。即使筹划到教育基金，前景也不可能根本性的改变；况且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为新毕业的学生创造就业条件。

那些自16世纪以来被殖民化的国家，受到一系列西方文化的冲击，它们在政治上独立后虽作了种种努力也无法免受其难。西方的思想，包括议会民主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输入，但都没有好好消化；西方的科学延长了人的寿命，但人口可怕地膨胀着，因为广大的农民仍坚持这样一种观念，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在城市里，那些处境孤立、受过土洋文化教养的人们，他们的收入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抱负也不能实现。西方的发展模式在群众中有很影响，可是从文化上讲他们是不宜效法的。主要的问题并非技术上缺乏经验，而是思想状态不对头。为了克服经济停滞

而拟订的种种发展计划，其失败又加深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事情被搅乱后，人们对另找合适的方法更缺乏信心。

在直接受西方影响的国家中，印尼可能是吃亏最大的一个。自从 60 年代中期苏哈托军人政权推翻苏加诺总统以来，人民遭到异常残酷的迫害，他们被迫沿着一条虚幻感人的经济道路行进着。也许是为了扫清发展的道路，效法西方，苏哈托军人政权怂恿屠杀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和无知农民，他们被诬指为共产党的支持者；许多人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约有 10 万人被囚禁，其中包括印尼最优秀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们在拘留中被折磨得萎靡不振，失去了活力。一切社会的自发力量和政治势力都遭到了摧残；人民仅有的一点积极性都被压制了，甚至农村合作社也不能幸免。在发展的名义下，人民被迫作出了 10 年的牺牲。可是，至今竟然还在争论：印尼人民目前的生活与苏哈托上台前相比，究竟有所改善呢还是更差了？尽管印尼有作为世界第九个大石油国的岁入，又有数以亿计的美元外援，世界银行于 1975 年 5 月指出，如果要使今天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大多数印尼人的生活有实质性的改善，那么在今后 10 年中还得增加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他们没有能力自拔于贫困，也无能力摆脱使人们丧失活力的迷信束缚和野蛮习俗。当然，也有些西方人对亚非国家的艺术十分赞赏，对一些属国的哲学发生了兴趣。一些研究人员对东方宗教却不得不肃然起敬。有些志士仁人却在探索着用外来手段拯救自己。自从 1853 年马克思论述印度以来，人们的基本看法没有多大变化。马克思写道：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

种不开化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六卷148—149页。——译者）

二次大战以后，人们用“不发达”来代替“落后的”，不久又代之以“发展中的”。这种变化的升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战后的善意和承认老的流行概念需要修饰一下。但最大的因素也许是用这种称谓来为新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名称是把许多国家残酷地引入歧途的婉词；它帮助人们制造幻想，以为前殖民地国家如果以西方为模式，接受西方的资本，最终会提高生活水平，能与西方并驾齐驱了。在西方，不仅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出口商，连经济学家和专家，在这一蒙骗人的言词的掩护下发展了一个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术语，其中有这个词很受欢迎，即“经济起飞”。80年代初，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在雅加达宣称印尼的“起飞”已经开始了。这一宣告象有魔法似的受到欢迎，当地报刊用大号标题刊登出来。可是印尼至今尚未起飞；其他人口众多的前殖民地国家也没有起飞。

另一方面，在西方有些专家中也发展着一种为那些旨在贬低

西方文化的人们服务的时髦风气。早在 1919 年，荷兰经济学家 G·L·冈格里吉普在一篇文章的注脚里含糊其词地用了这样一句话：“象爪哇人那样半开化的民族”，因为他看到“有相当数量的人对西方文明的嘲笑态度中明智地留有余地，常常伴随着对某种乌托邦或模糊其词的东方的赞美”。自冈格里吉普时代以来，人们不断发起对西方文化的攻击，而且日益加剧。他们竭力缩小它的成就，夸大其他文化的优点；结果一个有用的词“原始的”几乎被从语言中排除了出去，此词仅仅用于早已不存在的社会。有时候，有些对西方文化的诋毁者出于一种赞扬反对殖民主义态度的动机，但是歪曲依然存在。例如，J·C·范娄尔，他写的一些有价值的书死后才发表，于 1955 年出版，1967 年再版。他对一个学者的批判也许是正确的。他说那位学者关于印尼历史的书是在“船舶的甲板上、城堡的围墙上、贸易公司高高的阳台上”写成的。但他自己也许也曾经被人指责说，他也是在宫廷里写印尼的。

范娄尔的作品描写得非常详细，他常常援引马克斯·韦伯和其他社会学家的言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把 17 世纪时所谓爪哇人的“能力”与荷兰人的“力量”作比较时，力图指出欧洲人之所以能进行统治的基本原因，但是他失败了。范娄尔在解释荷兰人为什么能统治爪哇人时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他说：“荷兰力量的发展必须归因于……船舶的结实的帆缆和较快的航速、王家大炮的威力、兵力较大的机动性”。他在探讨欧洲人在亚洲建立政治霸权时说，“其基础不是凭他们发展较高的经济制度的优势”。这一点，他也许是对的。的确，事实上欧洲人把经济制度留在国内。但是考虑到一小撮荷兰人竟然能有成效地控制着偌大的东印度群岛这一情况，我们还必须看到荷兰文化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它在群岛有军事优势。范娄尔说，荷兰殖民者并没有把任何新东西带到印尼去。事实上，他们带去了最有破坏力的武器——欧洲式的活力；直到现在只有日本人在东方打交道时才有这种活力。

最明显的事实是，当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爪哇登陆时，在葡萄